

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论纲^{*}

董 彪^{**}

【内容提要】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这里蕴含着资本逻辑的两个层面，一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物质文明的财富逻辑，二是剥削劳动和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逻辑。在资本的双重逻辑中，资本的权力逻辑具有根本性地位。这是因为，它把资本本身视为一种权力，从而揭示了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资本权力在自我运行的过程中，将财富逻辑的“量”的属性变成自身的属性，为其力量的宏观拓展和微观深化开辟了道路。也正因此，资本权力才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异化了的的社会权力。

【关键词】马克思 资本逻辑 资本权力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不仅宰制着生产方式的宏观运行，而且按照自身的意志对社会生活实施微观操控。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马克思就深刻地预见到资本的巨大力量，指出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普照光”和“特殊的以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①，从而为破解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谜提供了钥匙。

* 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资本权力研究”（ZK20190145）阶段性成果。

** 董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博士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页。

一 资本权力的内涵特性

“权力”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将权力批判深入资本权力批判，才能理解马克思权力观的深刻意蕴。总体上看，马克思对权力的认识经历了从政治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从其《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的政治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站在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立场分析权力，对政治权力运行的基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逐渐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权力研究的重要性。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的政治经济学初步批判阶段，马克思开始从具体的经济活动研究权力，特别分析了劳动异化中蕴含的权力异化，并指出了生产权力对政治经济关系的决定性意义。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深入时期，马克思在一般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上，特别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权力研究视野由生产批判进入了资本批判，并指认资本是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经济社会权力。把资本视为形塑现代世界的总体性经济社会权力，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成果。^①

把资本理解为一种权力，源自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深刻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必须指出，这种社会关系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特殊的社会关系，它包含着“财富增长”和“社会分化”的双重性。这是因为，在私有制及其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物的占有的不平等性必然形成不等的社会地位和不对称的社会力量，由此必然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有意志的、支配性力量关系，即权力。资本就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以劳动者与资本家的雇佣关系为中介的经济社会权力。这种权力创造了富有、强大的资本家阶级，同时也创造了贫困、弱小的劳动者阶级。首先，资本权力只有在生产关系中才能得到最全面最集中的体现。资本权力在结果上集中地体现为资本的剥削权力，即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无偿的剩余索取权。既然剩余价值是在生产中产生的，那么资本权力的存在也不能脱离生产、离不开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之前，大部分

^① 参见董彪《马克思的权力观：从政治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门》第3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经济学者均把资本作为物质生产要素来看待，其结果是将生产领域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流通领域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掩盖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从而无法正确理解资本的本质与社会关系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是单独个人必然面临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剥削关系是由整个生产导致的客观必然性关系。脱离生产关系，“把资本真正归结为纯粹的交换，从而使资本作为权力消失”^①，资本就会变成一种神秘的、拜物教式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再三强调，资本是一种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② 其次，资本权力是通过“资本—物”为手段得以实施的。一方面，资本权力离不开物。只有以物为中介，资本关系才能成为一种建立在人对物的支配权力基础上的人对人的支配权力。所以，资本不是物，但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③。另一方面，并不是任何物都是资本，它只有处于资本关系之中，成为资本权力的工具和手段时才能成为资本。生产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④。最后，资本权力的核心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传统社会（如朝贡社会）的统治的方式中也包含了通过物实现对人的支配的形式，但在这种社会，作为物的财富，主要体现为与人的主体性相对立的物质性产品；财富对人的支配，其目的在于奢侈消费、享受挥霍，而不是单纯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权力支配雇佣劳动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促进资本增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⑤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和一般形式的“权力”（如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宗教权力、贵族权力）一样，资本权力也是一种有意志的力量支配关系，一种能够使对象在违背自身意志的前提下仍然服从的力量。那么这种权力和其他权力形式又有何不同呢？这里需要探讨一下权力的类型。按照实施强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92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87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6页。

和实现方式，权力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硬”权力，指权力施行者通过身体残害、生命胁迫、财产损害等暴力方式迫使对象服从自身意志的力量，如军事征服、政治强制、法律制裁、人身财产伤害等。这种权力往往是直接的、可见的、无条件的，甚至可能是不计成本的。二是“软”权力，指权力施行者通过制度、规则、监督、说服等方式操控对象思想行为的权力形式，常见形式有契约、法律、管理制度、宣传说教等。此类权力之所以是一种软权力（软暴力），是因为它往往是以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权力对象自愿接受的外在性支配力。并且，这种支配力一般不是以身心伤害为目标（尽管它最终很可能产生这种结果），而是以某种利益或效益为目标。三是“隐”权力，指权力主体以一种不在场的形式对权力对象实施的隐蔽的、神秘的精神操控，它是硬权力特别是软权力内化的结果。如果说硬权力、软权力还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规训和说服，那么隐权力则直接体现为一种内在的自拘性和对权力的自觉认同。正如阿伦特所说“无人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无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①

那么，资本权力在权力的谱系上处于什么位置呢？从横向来看，资本权力是这三种权力的集合。资本一般不直接诉诸暴力，但它以国家的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法律权力为后盾，在必要的时候（如资本的权力或权利受到侵害），资本就可能以暴力（硬权力）的方式出场。资本权力实际施行的主体层面，就是以市场上等价交换的契约制度为基础，在生产生活领域中实施的身体规训、生命操控、意识控制、欲望操控、主体构建的权力（软权力）。而生活世界的抽象化、理性化特别是拜物教化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施以粉墨、罩以烟雾，制造了主体的幻象、市场的幻象以及资本主义的似自然性幻象。这不仅导致整个社会生活获得了一种伪具体性和意识形态外观，而且使资本权力由外在的控制变成了内在的“自拘”（隐权力）。从纵向来看，资本主义早期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权力往往伴随着血腥和暴力，对内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对外种族灭绝式的殖民扩张均可见一斑。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对自然法的推崇，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价值观念的信仰，资本权力变得温柔、理智甚至文明化，它是一种相对封闭的

^①（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第72页。



经济权力，主要表现为工厂中对体力劳动者及其生产力的操控（软权力）。而在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随着生产的全球化，消费社会和服务社会的来临，资本对生活世界的统治则表现为对生活世界的吸纳（特别是实质吸纳），表现为生活世界的全面抽象化、理性化和拜物教化（隐权力）。

二 资本权力的机制与效应

资本权力不是单向的、静态的社会关系结构，而是在资本增殖过程中不断生成、自我扬弃的动态过程。随着剩余价值榨取能力的提高，资本必然会不断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扩张自身的权力意志。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中，在资本形成、资本增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通过市场活动的交换权力、生产过程的规训权力、消费行为的欲望权力，构成资本权力运行的内在机制。

资本权力形成的基础在于货币资本的交换权力。马克思认为，和传统的权力形式不同，资本是一种以财产权和价值交换为基础的特殊权力形式。一方面，所有权制度是资本权力形成的物质基础。只有私人财产的占有权、处置权、收益权等受到保护和认同，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才可能凭借财产对他人形成支配；只有劳动者成为能够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自由人，他（她）才可能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另一方面，价值交换原则构成了资本权力形成的市场机制。资本不是以物质暴力或精神感召的方式使劳动者执行自身的意志，而是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用货币换取了劳动力的支配权，而这种支配的目的不过是使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力量扩张。马克思指出，“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①。在市场中，由于所有制地位的不同，资本家和普通劳动者拥有的货币在“质”和“量”上均有不同。前者拥有的货币不仅可以用于购买必要生活资料，而且可以变成支配他人的资本；而后者拥有的货币却仅能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甚至不足以购买这种生活品）。由于资本增殖的需求和劳动力生存需求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6页。

不平衡性，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交换必然表现为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抗和买卖博弈，即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由于这种权力被自由契约和形式平等的市场交换原则掩盖，因而这种交换权力只是资本权力的表现形态。正如列宁所说，“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中，从货币权力的出现中，产生了资本权力”^①。

劳动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者的身体、生命以及意识的控制权力。资本不是在流通中而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实现价值增殖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不仅是财富创造的过程，同时也是权力实施的过程。资本权力对劳动生产过程的微观控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身体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以分工、协作、机器等为手段对劳动者个体的身体空间、身体活动进行细微性的操控。二是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生命政治经济学，即资本对劳动者群体的生命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微观操控，包括对代际以及整个人口结构规模的生命操控。三是资本权力对劳动者的心理和意识进行控制，包括财权力与类意识异化、技术权力与意识物化两个方面。身体的时空组合形式、动作节律状况以及其中包含的组织管理、指挥调度、监督惩罚，不仅构成了资本生产力的微观组织形式，而且构成了资本的微观权力结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福柯的权力理论关联并融合起来，形成理解“资本-权力”的新图景。

消费活动中资本对劳动者的欲望和主体的操控权力。通过生产过程，资本获得的只是剩余价值的商品形式，唯有这些商品经由市场成为交换价值的代表形式——货币，剩余价值才能真正实现，而要实现和扩大交换，就必须不断地刺激消费。一俟消费堕入资本逻辑，消费就被资本化并成为资本施展自身权力的新场所。这是因为，“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②。消费活动中的资本权力一方面体现为资本对欲望的操纵，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资本对消费者主体性的形塑。就前者而言，资本既不断地制造匮乏、生产虚假需求，又不断地填充这种欲望和需求，从而使消费的“匮乏-需要”机制纳入商品资本的增殖逻辑之中。就后者而言，资本用庞大的商品-物包围人、诱惑人，使人由主体翻转为客体；用时尚和符号来区分人，制造人的个性差异和身份认同；由媒介权力来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86页。



消解人，使人丧失反思主体性。资本通过操控消费者的欲望和主体性来实现价值增殖，从而构成了资本权力的发展形态。

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流变和循环过程中，在“交换—生产—消费”机制的作用之下，资本的代理人——资本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通过市场活动的价值交换权力、生产过程的劳动规训权力、消费行为的欲望权力形成了资本权力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分工、机器、竞争、信用、市场开拓等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资本权力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领域活动，它和世俗帝国的国王、一神教的教主一样，拥有称霸全世界的野心，并想在整个世俗社会之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资本要实现这一权力意志，就必须克服来自自身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限制，将外部世界内部化，内部世界资本化，从而使人类存在的最后一块领地——生活世界也被纳入资本权力的统治之中。它既体现为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形式吸纳，即将非资本主义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纳入资本权力的掌控之中；又体现为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实质吸纳，即对已经资本化的对象（如身体、生命等）进行二次开发、深度剥削。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双重吸纳最终导致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效应：一是事物本身和人的存在及其社会关系的抽象化；二是人的社会活动、欲望系统、行为体系、价值体系的理性化；三是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以及市场拜物教、观念拜物教导致的整个生活世界的虚假化和伪具体化。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权力的扩张形态，资本对生活世界的控制显得更微观、更弥散、更隐蔽、更神秘，因而也就更有效，它最终从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高度完成了对现代生活世界的资本现象学构建。特别是拜物教及其意识形态统治的深入和泛化使资本权力变得更加碎微涓细、隐而不彰，但这不是使资本权力减弱了，而是使资本权力加强了。

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导性生产方式，“资本”本身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神秘意义，成为“普照光”和特殊的“以太”。这在事实上表明，资本关系和资本权力得以在现代社会取得普遍的支配地位。它不仅是衡量存在者是否存在的尺度，也是衡量存在的价值比重的尺度。无论是自然之物还是社会之物，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无论是生产关系还是生活关系，都成为资本统治和支配的对象，成为资本生产和增殖的要素。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普遍权力，资本是一切社会的社会关系围绕其运转的“中枢”和“太一”，而现实事物以及其他权力形式则成为其具体的“分殊”。

三 从资本权力看资本逻辑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资本逻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的逻辑，指资本生产总是表现为商品的生产 and 再生产，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二是“关系”的逻辑，指资本生产本质是追求价值增殖，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劳资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既要积累财富，又要积累权力；既要追求剩余价值，又要追求剩余权力；既要构建财富的社会秩序，又要构建相应的权力秩序。正是财富与权力的相互规定、相互促进，资本最终成为形塑现代性和生活世界的总体性力量。

资本权力是一种与财富创造融为一体的、不同于传统权力的全新权力形式。将资本视为一种权力，并非完全以权力逻辑的单一进路去理解资本（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而是必须将之与资本的财富逻辑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资本权力来源于资本的财产权利（财富权力）并展现为对价值增殖的追求。也正是因为对财富的追求成为自由主义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权力形式，如国家权力、法律权力、军事权力、社会文化权力虽然都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具体方式，在根本上都无疑受到资本权力的控制，从而导致了通常所说的“权力资本化”。

但需要看到的是，在资本的双重逻辑之中，资本的权力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如前所述，“资本权力”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形成的“资本”与“权力”的“双螺旋”结构。“资本”之物性为“权力”之力量奠定基础，而“权力”力量则进一步促进“物”之增殖。在这双螺旋结构中，已经内在地孕育着既统一又分裂的力量。所谓“统一”，就是资本为求得最低成本消耗、最大价值增殖而形成的能使一切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的力量；所谓“分裂”，是劳动与资本因绝不可能真正“平等地”获得财富增殖而必然使世界最终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二元对抗。可见，只有在资本的双重逻辑中，权力关系才能体现不平等、不对称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体现资本的本质（也就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本质）——如果仅仅停留在物的层次，就可能使对资本的认识停留在平等交换的假象之下。与此同时，财富逻辑的“量”的属性被吸纳到权力逻辑的“质”的属性和内在机制之中，变成资本权力的“量”。也就是说，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权力，也是一种“权力经济”。资本扩张与其说是财富数量的



扩张，不如说是资本权力自身的扩张。这种扩张恰恰构成资本权力的另外两个层面，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前者体现为资本权力击败各种权力形式，在空间上为自己开疆拓土，进而使得工厂内部的“剥削逻辑”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殖民逻辑”，使劳资关系问题变成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①后者则是指资本权力变成一种将成本、效率、收益纳入精细化计算的权力技术，试图通过数字化的计算、系统化的分析、规范化的操作、精细化的监督，对身体、生命、意识、欲望、主体进行深层的微观控制。

在现代市民社会内部，资本权力始终发挥着形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巨大力量，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异化了的经济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统治对于现代社会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权力打破了传统权力关系对分工、交往和现代生产的限制，推动了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高扬了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另一方面，资本权力通过推动商品化、货币化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通过对劳资关系的支配导致劳动者自身及其劳动能力的异化，导致社会生活的拜物教化、功利化和工具理性化，这又展示了资本逻辑对人的宰制。资本权力运行的双重效应既是资本双重逻辑的深刻体现，又是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所在。扬弃并超越资本权力的现代悖论，必须在唯物史观的批判视野中认识资本运行的内在本质，揭示资本生产及其权力生产的历史界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质就是在保证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利用资本吸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能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现代改变。但同时资本也带来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需要在正确认识资本双重逻辑的基础上积极应对资本权力，使资本的力量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相适应。进入新时代，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利用资本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力量，正确处理资本力量在生产劳动领域、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微观渗透所引起的各类矛盾，为广大劳动者实现美好生活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① 参见郗戈《〈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7期。